

“制造”：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细节

□ 程 巍

英国左派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为多人合写的论文集《传统的发明》(1974)撰写导论时,一开篇便提到当时的英国王室:“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的盛观显得是如此古老,并仿佛与无法追忆的往昔紧密相连,在此方面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与之匹敌。”不过,他马上证实说,这些看似古老的盛典仪式其实并不古老,“现代形式的这种盛典事实上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产物”,它们的“古老性”及其“传统”是被“发明”或者“制造”出来的。自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军国主义大盛其道的时代,各国皇室乃至外交官都是一身漂亮的戎装,而盛大的典礼不仅讲究华丽的排场,而且总是伴随着仪仗队和阅兵。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一方面,这种“发明”与“创造”并非始于

19世纪末,例如在1851年伦敦博览会开幕式上英国王室就营造了一种“万国来朝”的盛大场面,其中出现了一个假扮“中华使节”的演员,向维多利亚女王行礼;另一方面,还见之于“日常生活”,例如维多利亚女王在丈夫死后7年出版自己1842—1861年间的日记时经过他人之手精心的“编辑”,而其中的苏格兰“高地日记”为营造英格兰与苏格兰亲如一家而“创造”了一个“如画”的苏格兰。本期两篇文章《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与“活人展”》和《创造苏格兰:作家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如画帝国》分别涉及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这两起事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陈琰妍)

1851 年伦敦万国博览会与“活人展”

□ 陈露薇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2》，沈弘编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

John Timbs, *Extra Volume of the Year-Book of Facts in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Constructive Details of the Building, the Most Remarkable Articles and Objects Exhibited, etc.*, London: David Bogue, 1851.

【导读】 指定斌椿随往，为不得已，一则朝中大小臣工于洋情隔膜，“总苦眩晕，无敢应者”，二则即便派官位显赫者同去，又恐伤朝廷的尊严和体面，而斌椿官职不过正四品，其时又是正三品的总税务司赫德的“文书”（秘书），名义上就相当于赫德率领考察团了。

【导言】 英国方面不只是自作主张在“水晶宫”里替中国设立了一个“中国展区”，考虑到 1851 年 5 月 1 日开幕式那天，维多利亚女王将亲临“水晶宫”，在那里接见各国使节和政要，那么，让一位“中华使节”出现在恭立于伊丽莎白女王御座前的各国使节和政要的行列里，就更能体现大英帝国的显赫声望了。

一

1863 年 11 月罗伯特·赫德出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次年被朝廷加授按察使，未及而立就跻身于正三品大员之列。又一年，海关总税务署由上海迁至北京，赫德也得以与京城政界来往，这位来自英国而负责大清税务的客卿十分具有政治头

脑，他通过由京外到京内的观察，发现大清官僚体制积弊处处，遂著成《局外旁观论》，于 1866 年 11 月 6 日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中写道：

制度本极精详，而日久尽为虚器。外省臣工，不能久于其任，以致尽职者少，营私者多。寄耳目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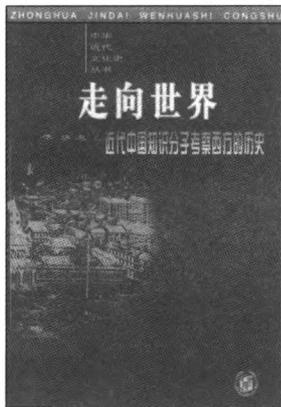
非人，而举劾未当，供贪婪于戚友，而民怨弗闻。在京大小臣工，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飭，如是而欲民生安业，岂可得耶？……通经原为致用，而今之士人，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釐奸。^{[1]1667}

话说到这份上，赫德也就不避更可怕的预言了，称“法本善而反恶，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只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而他提出的对策之一，是“凡有外国可教之善法，应学应办”。^{[1]1666,1673,1671}赫德认为英国体制远胜于大清，希望朝廷能派员去英国考察，而次年他要返回英国成婚，于是向总理衙门告假，并提出派员随行。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细听其言，又细阅其文，认为击中要害，遂于1866年2月20日上一奏折称：

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

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兹因总税务司赫德来臣衙门，谈及伊现欲乞假回国，如由臣衙门派同文馆学生一二名，随伊前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似亦甚便等语。臣等伏思……与该税务司同去，亦不稍涉张皇，似乎流弊尚少。惟该学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必须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庶沿途可资照料；而行抵该国之后，得其指示，亦不致因少不更事，贻笑外邦。

兹查有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现年六十三岁，系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善禄管领下人。因病呈请回旗，于咸丰七年在捐输助振案内加捐副护军参领銜。前年五月间，经总税务司赫德延请办理文案，并伊子笔帖式广英襄办年余以来，均尚妥洽。拟令臣衙门札令该员及伊子笔帖式广英，同该学生等与赫德前往。



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2]

指定斌椿随往，为不得已，一则朝中大小臣工于洋情隔膜，“总苦眩晕，无敢应者”，二则即便派官位显赫者同去，又恐伤朝廷的尊严和体面，而斌椿官职不过正四品，其时又是正三品的总税务司赫德的“文书”（秘书），名义上就相当于赫德率领考察团了，这就像两年后（1868）清朝派往美国的第一个使团由清朝聘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领衔。准奏后，由赫德的这位下属携子广英及天文馆三学生组成考察团，于1866年3月随赫德赴欧考察。

三年前，英国历史学家乔治·特里维廉在英国殖民地印度考察教育，却对那里流行的一种不见于英国但对改变英国体制来说非常关键的制度颇有兴趣，这种制度系由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引入，模仿中国科举取士制度而以考试选拔官员。其时，英国本土的官员升迁受制于阶层等级制，贵族世袭制阻断了其他阶级的众多才干之士的仕途，但英国的工商业繁荣及其海外拓殖急需大批真才实学之士，而对一切阶层敞开大门的考试制度才能确保人才源源不断。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引入考试

选拔制度，是“国家公司化”的尝试，而特里维廉从中看到它对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启发，于是撰成《考试选官》（*The Competition Wallah*）一书，于1864年出版，并与在英国政界颇有声望的舅舅托马斯·麦考利一起，联合其他一些政要，积极推动英国文官制度改革。1870年6月英国颁布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二个枢密院令，设立文官委员会，确立了通过考试公开竞争的选拔官员制度，而对外交部派驻中国的官员考试还特别加考中文，并在诸门考试通过后，被派往英国驻华公使馆作为“翻译见习生”学习两年，学习结束后再由公使出题考试，合格方具备到各领事馆任职的资格。

斌椿一行于1866年5月抵达英国，游览一月，后又访欧陆，不辞舟车之劳，由荷兰到俄罗斯一线连续访问多地。斌椿不识西文，不知西情，又因总理衙门令其“所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详加记载，绘图加说，带回中国，以资印证”^[3]，因而所见多为浮光掠影，所记也多为行程宴饮酬答。此外，总理衙门之令并不包含外交使命，斌椿一行并非外交使团，顶多是一个“官方考察团”，但其所经欧洲诸国，多以外交之礼待之，使斌椿恍若有中华使臣之感，因而对英国太子曰：“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

命游历，始知海外有如此盛景。”^{[3]28} 归国后，他把旅行日记加以考订，以《乘槎笔记》刊行，并于末尾特加按语曰：“外洋各国，自道光庚子通商，来中华者争先恐后。而中国士大夫，从无至彼国者。同治丙寅正月，斌椿奉命往外国游历。”^{[3]55}

但“中国士大夫”（含“读书人”）之去外洋并不始于斌椿，例如根据德国历史文献，可知早在1812年，广东人冯亚星和冯亚学宗室兄弟就远渡重洋，先是在圣·赫勒拿岛伺候被英国流放到岛上的拿破仑，后又去了德国，进了哈勒大学，常年与德国知识圈子来往；至于普通中国人（“苦力”一类），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经南洋（尤其是当时被英印殖民地纳入管辖范围的海峡殖民地三埠——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而流散于欧洲各国者，并不少见。

欧洲各国以“升格”的外交礼节厚待斌椿一行，一则出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考虑，一则出于欧洲帝国之间的海外竞争，均欲通过斌椿一行传话于中国宫廷，以求建立“友好关系”。此外，还有一重隐蔽的心理原因：自17世纪的来华耶稣会，直到18世纪末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已为欧洲心灵建构了一个高度文明的天朝之国的形象，这一形象虽然在19世纪初开始变得暗淡，

但流行于欧洲的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之精良华美，又非一种野蛮的文明所能制作出来，加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文学浪漫主义陶醉于“东方情调”，于是面对“天朝使者”产生一种复杂的情感，急于以自己的器物之精和礼仪之美来向他们炫示自己并非“天朝”所说的野蛮之邦。于是，这个来自中国的“考察团”就被当作“天朝”第一个“使团”，斌椿一行所到之处皆大受欢迎，伊丽莎白女王不仅特于白金汉宫举办几百人的大型宫廷舞会，又于次日屈尊接见。斌椿在日记中记载当日情形云：

入宫门。内外仪仗将弁与昨日同，惟多乐器朱衣四十人。宫官衣金绣者，导予至一所，坐候宣召。申正，内官数人来导。入门数重，至内宫。君主向门立。予入门侧立称谢。君主问：“来此几日矣？”予答曰：“来已兼旬。”又问：“敝国土俗民风，与中国不同，所见究竟如何？”予对曰：“来已兼旬，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且蒙君主优待，得以浏览胜景，实为感幸。”君主云：“此次游历，惟愿回至中华，两国愈加和好。”予称谢，始出。^{[3]28}

这一次，维多利亚女王总算没

有“被人糊弄”，终于见到了一个尽管级别不高却货真价实的“中国官员”，不必像15年前在伦敦博览会开幕式上那样当着一列列觐见的外国外交人员，向一个次日才被报纸揭露出真实身份的“中国官员”回礼了——那只是在泰晤士河一条中国船上唱中国戏的草台班子的一个男演员，大概是演“正净”的，一穿上那身“朝廷重臣”的戏装，就进入了角色：他走进“水晶宫”，就像走上舞台一样。

二

1848年对英国来说处在这么一个转折点：北美十三州殖民地通过1775年到1783年的革命脱离了英国，使英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生产资料来源、产品市场和硬通货（金和银）来源，而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开始，一直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国几乎又一直纠缠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即便到了战后，欧洲依然动荡不断，到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才渐渐进入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另一方面，就英国国内而言，自北美独立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一直处在战略收缩之中，导致国内的贵族地主阶层势力重新上升，而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贵族地主阶层的文化代

理人通过雅士主义和文学浪漫主义，唱响了反资产阶级和反现代工业的乡村牧歌，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所讥讽的那种“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榜文，半是过去的回声，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内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4]423}

但自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后，英国在西半球的战略退缩开始被其“东向”拓殖政策所弥补，即强化其殖民地印度作为一个“前进基地”，向欧洲人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就一直视为富足而神秘之国的中国进发，那里有可以推动英国工业化所需的大量硬通货——白银。这就是维多利亚女王为何登基不过几年就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核心原因。得自“东方贸易”的大量财富、白银的源源不断“回流”以及不断更新的工业技术发明，确保了英国工商业的突飞猛进，国力一下子超过了欧洲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宿敌法国。实际上，当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写作《共产党宣言》时，他们主要是以自己客居的英国的“资产阶级”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标本的：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

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404}

到1849年，在伦敦举办一场规模巨大的博览会，向英国人和世界各国显示英国作为进步时代的“世界中心”的富庶和强大，就不仅是一个向内建构民族认同、向外塑造英国形象的问题，而是事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问题，为此，这个博览会一定会摆脱欧洲的“地方性”，将整个世界象征性地陈列在伦敦。

在1851年博览会之前，欧洲并非没有举办过“博览会”，法国在1797年到1849年间就举办过11次，甚至“Exposition”（博览会）一词便是来自法语，因此，正如约翰·廷布斯在1851年出版的《年鉴》“伦敦博览会”增刊的序言里所说，“当

我们最初宣布要举办大博览会时，‘博览会’一词还是采用的法语的‘Exposition’，但很快就调整为更英国化的词‘Exhibition’”^{[5]3}。但此前的“Exposition”一般只具有国内而非国际的特征，尽管参展商可能来自欧洲许多国家，此外，它们采取的展出方式一直是零售商橱窗展示，“但为了办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博览会，我们必须把眼光投向东方，那里的集市（Bazaar）体现了一种分类体系，而伦敦博览会部分采用了这种体系”^{[5]3}。所谓“东方集市”的“分类体系”，是将市场划分为不同区域，同类商品在同一区域展示。为此，一个因南美荷叶而有的设计灵感，使得展馆的设计师将伦敦博览会的展馆设计成了一个类似带棚顶的巨大“集市”：它以钢铁作为框架，大量采用玻璃，不仅透光效果好，而且空间阔大，而这个巨大的空间被纵横的“街道”划分出不同的区域。

由于伦敦博览会寄托了英国作为“世界中心”的众多雄心壮志，因此，尽管它的全称是“万国工业品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但展示的并非全是“工业品”，而且，出于一种特别的设计，还将展示“万国来朝”的景象。维多利亚女王特意为博览会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

而其主席就是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由于英国法律规定“驸马”不能干政，维多利亚女王就变相地让她这个颇有才干的丈夫主管一些重要的非政治事务，如让他主管宫廷财务。不过，阿尔伯特除了具有理财的才干，还喜欢摆弄机器，更喜欢艺术，所以又成了英国艺术协会主席，而1851年伦敦博览会将是一个建筑艺术的盛事，阿尔伯特自然又成了这个皇家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当1849年艺术协会的年会一结束，他就宣布：“现在是为伦敦大博览会做准备的时间了——这个大博览会将办得能够配上英国的伟大，从范围和利益上它将不仅仅是一国的，而是整个世界的。”^{[5]16}他忘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典型逻辑是：英国的利益就是世界的利益，如果不能以贸易方式获得，就诉诸战争。伦敦博览会之后不几年，英国对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水晶宫”尚在设计过程中时，皇家委员会就开始向各国政府发出参展的邀请，并以条文明确规定不接受个人参展的申请：“外国生产商的任何产品，不管属于谁，不管来自何地，只有经过该商品生产国的中央政府的批准方可参展。皇家委员会将向各国中央政府通报其产品展馆所能占用的空间大小。”^{[5]23}廷布斯谈到了这一规定的其

他方面：“每个参展国家任命若干委员，人选为该国科学、艺术和制造领域的杰出人士；每个参展国将承担这些免税参展产品往返运费及其途中产生的其他费用。若与个人参展商直接进行联系，来往函件堆积如山，颇不切合实际，因而，各国中央政府不可或缺。”^{[5]23}换言之，1851年伦敦博览会具有浓厚的官方性质，是英国政府与各国官方（而且一直强调是“Central Authority”，即能代表国家的“中央政权”）之间的直接联系。

三

伦敦博览会的展品按来源分为三个部分：（1）英国本土各地；（2）英国各殖民地；（3）外国。但“英国各殖民地”中不见“香港”，而“外国”中却列有“中国”，而“中国”名下的展品全来自英国的机构、个人收藏乃至伦敦的商店，其中夹杂着不少日本以及东亚其他地区的产品，^{[6]208-210}并非全是中国产品，无一件展品来自中国人，更别说来自博览会章程所要求的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以肯定，既然英国强调伦敦博览会不同于以往的博览会，具有“世界”和“国际”的特征，而且博览会的全称——直译的话——也是“所有国家（All nations）的工业品

大博览会”，那么，皇家委员会一定会致函中国政府，邀请其参加伦敦博览会，因为少了中国，就等于少了一个“东方”。

问题是清朝政府有无兴趣参加博览会。大清虽败于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但一则因为尚未失去的傲，一则因为新近受到的辱，使大清朝廷断断不会放下身段，向“英夷”派出参展商以躬逢其盛。不管清廷对英国政府的邀请如何答复，或竟无答复，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清廷没有派出任何人携带任何产品参加1851年伦敦博览会，因此，博览会的组织者皇家委员会只得从英国各处凑合一些“中国产品”权当中国参展产品。唯一直接来自中国的是列在首位的28件产品（其中包括两件日本产品，即“黄铜”一类），但它们“来自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由英国商务部提供”^{[6]208}。

但英国方面不只是自作主张在“水晶宫”里替中国设立了一个“中国展区”，考虑到1851年5月1日开幕式那天，维多利亚女王将亲临“水晶宫”，在那里接见各国使节和政要，那么，让一位“中华使节”出现在恭立于伊丽莎白女王御座前的各国使节和政要的行列里，就更能体现大英帝国的显赫声望了——谁都知道，尽管中华帝国间或有称臣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但自

元朝开始，中华帝国已非昔比，它已习惯于别国向它称臣。

维多利亚女王有记日记的习惯，而博览会开幕式可说是“我们伟大的国家”“我们的生活”以及“我本人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然得笔之于日记本。她详细记述了5月1日从白金汉宫出发到“水晶宫”所在的海德公园的过程，叙述偏重于“家庭价值”——维多利亚女王向英国人大力提倡“家庭价值”，因此在这么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她更要显示她的妻性和母性——随着女王一家进入“水晶宫”，维多利亚又描述了水晶宫的富丽堂皇，然后一笔带过高高的御座前一系列列的政要和外交使节以及阿尔伯特作为皇家委员会主席的致辞和她的答词。答词完毕，“坎特伯雷大主教念了一段简短而合乎气氛的祈祷词。随后，合唱队开始合唱亨德尔的《哈利路亚》，合唱还在进行当中，那个中国官员（the Chinese Mandarin）走上前来，向我行礼。他礼毕后，长长的馆游就开始了，队列安排得十分得体，秩序井然”。^[7]

一位“中国官员”突然出现在万众瞩目的博览会开幕式上且在维多利亚女王御座前行礼，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次日，这一事件就被作为“头号新闻”遍登于伦敦各报并附有插图。这对不久前

通过战争打败“天朝”并逼迫其签订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的英国来说，当然是莫大的光荣。尽管到5月10日《伦敦新闻画报》头版依然登载了两幅巨大的素描图片（一是维多利亚女王接见中国官员；一是长长的游行队列，其中那个“中国官员”排在非常显赫的位置），并添了一个题目“伦敦首届世界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中国官员”^[8]，但偏偏有些记者觉得此事蹊跷，像侦探一样挖掘这位“中国官员”的来路。

消息很快证实，这位“天朝官员”并非中国政府所派，而是此前停靠在泰晤士河教堂码头的那艘中国帆船“耆英号”的那个叫何辛的中国船主自作主张，在开幕式那天一早，身着实为演出服装的“天朝官服”，走下驳船，不受阻碍地走向“水晶宫”，走向正在二层大厅与几个重要人物聊天的威灵顿公爵，与他握手，又与其中一位侯爵相互致意，然后与他们一起出现在开幕式的觐见礼上，站在最前列。这位“天朝官员”向站立在“水晶宫”台基上的维多利亚女王反复行鞠躬礼。女王注意到了他，特意让他跟在威灵顿公爵后面，与参加完觐见礼之后排成一长溜队伍的皇室成员及各国要人一起参观“水晶宫”。^[9]

“谁也不认识他。”博览会开幕式司仪之一的莱昂·普莱费尔后来回

忆当时的情形说，“或许他就是中国皇帝本人，悄悄来到了开幕式。但可以肯定他不在名单之列，我们这些负责仪式的人不知道如何安置这位天朝大人。张伯伦勋爵也被弄糊涂了，过去请示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如何办理。我们被告知他的官位毋庸置疑，最好将他安排在坎特伯雷大主教与威灵顿公爵中间。他排在这个显赫的位置，浏览了水晶宫，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感到兴奋和高兴。次日，我们查清楚了，原来这个中国佬是一只驳船的船主，他的船此前获准停靠在泰晤士河边，随便是谁，花一先令将可以上他的船参观”。^[10]

“耆英号”是一艘以风帆为动力的排水量达到惊人的八百吨的中国商船，以驻广州钦差大臣耆英命名，而耆英正是那个代表中国政府与英国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官员。鸦片战争之后，“耆英号”被一个英国人购走，开始了环球航行，在1848年之后停在了伦敦的泰晤士河畔，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征”的水上娱乐场所。8月2日《图片新闻画报》也刊登了一篇附图文章《在“耆英号”兵船上的中国武术表演》，称“在市政当局（泰晤士河管理处）的准许下，‘耆英号’中式兵船现在已经在伦敦斯特兰德大街与埃塞克斯街末端交界处站稳了脚跟”“该船目

前从早到晚都对外开放，船上有各种不同的中式娱乐表演，包括戏曲演唱、乐器演奏、武术表演和变戏法等。那些再也不想回去做海上航行的中国船员们现在变成了演员，其艺术水准堪与维多利亚或阿斯特利等处歌剧院的明星演员们相媲美”。^[11]不过，这篇报道却根本不具备去重提“耆英号”的船主，那个化装成“中国官员”，大模大样走进“水晶宫”的华人男子。

这起在一些英国人看来似乎破坏了“水晶宫”开幕式的庄严气氛的事件，给人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一年后《布莱克伍德杂志》的一篇题为《在内和在外的天朝人》的文章在谈到“人类移民时代的来临”（主要指中国人大量移民海外）危及英国及其殖民地安全的时候，又谈起了它，既觉得此事十分蹊跷，又感到怒不可遏：

英国国内的人除了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和象牙制品，对中国就一无所知了。从议会和各部一直往下，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国土、政府或者政策，谁都和中国人之于英国人一样无知……中国产品在美妙绝伦的博览会展品中占据的位置并非不起眼，但那主要来自英国人的私人收藏，我们国内的公众对此已然熟悉。不过，在博览会开幕式

上，却有一个显著的例外——那是中国制造者们送来的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产品，就站在女王身边，被证明是永远难忘的那一天的最引人注目的对象。那么，这个吸引了众人目光的天朝官员是谁？他帽子顶上的顶珠是红色，还是蓝色？老皇帝给了他多少盒人参来奉承他？他是否曾蒙受皇恩，获准在帝国禁宫里骑马？最后，他是否被授予天朝贵族的三眼孔雀羽毛，或任何带眼的孔雀羽毛？他都不是！——他不过是一个苦力或者手艺人，常在泰晤士河上那只被我们一些报纸说成“帝国驳船耆英号”的中国驳船上扮演中国官员，而就是这么一头穿着官服的猪，冒失地闯进了云集在四壁像仙境一样美轮美奂的“水晶宫”的各国名流的行列！^[12]

他对当时报纸上的标题——“何辛阁下”“身穿中国服装的中国绅士”“大人阁下”“由秘书陪伴的中国代表”“声名显赫的外国人”“中华大帝国的代表”等——感到气愤，觉得这些名称与何辛本人一起耍弄了英国人。但这绝不可能是何辛自己开的一个玩笑，或某个英国人私自搞的一个恶作剧，因为由皇家委员会秘书迪格比·威亚特签署的《参观规则》明文规定：5月1日“开幕式只有持长效票（Season ticket）者

允许进入”，之后的参观时间“持长效票者”依然“可由任何一个入口进入”，而“普通购票者从哪个入口购票就从哪个入口进入”^[13]。这说明“长效票”是一种特权票，而且考虑到开幕式的来宾多为各国使节和政要，那么，“长效票”大有可能为皇家委员会赠送——至少不能在公开的票务处买到。

前面曾引用维多利亚女王5月1日日记，内称“合唱还在进行当中，那个中国官员（the Chinese Mandarin）走上前来，向我行礼”，可是，作为一项重要仪式，500人的合唱队还在合唱宗教歌曲《哈利路亚》的时候，“那个中国官员”贸然出列行礼，实为失礼。其次，日记写到这里才第一次出现“中国官员”，为何在“中国官员”前加了一个定冠词“那个”（the），而不是不定冠词“一个”（a）？显然，她本人对在“水晶宫”的各国使节和政要的行列里看见“那个中国官员”并不感到意外。意外的倒是前面提到的博览会开幕式司仪之一的莱昂·普莱费尔，作为司仪，他本该对参加参观的各国使节和政要的名单了如指掌，正如前面所引的他一年后的回忆：“谁也不认识他”“可以肯定他不在名单之列，我们这些负责仪式的人不知道如何安置这位天朝大人”，而“张伯伦勋爵也被弄糊涂了，过去请示

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如何办理。我们被告知他的官位毋庸置疑，最好将他安排在坎特伯雷大主教与威灵顿公爵中间”。

显然，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事先已知道“一个中国官员”将出现在参观的各国使节和政要之列，并在“被弄糊涂了”的张伯伦勋爵请示如何办理时，明确告知“那位中国官员”的“官位毋庸置疑”，并且还亲自为其在队列中安排了一个显赫位置。这只有一种可能，即让“一个中国官员”出现在“水晶宫”是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合谋策划的，然后由某个可靠的人秘密完成：去“耆英号”秘请那位扮演“净旦”的华人船主在5月1日博览会开幕式上扮演一个“中国官员”，并为他提供了一张“长效票”。到了5月1日开幕式开始（上午10点）前，这位一身“朝服”的“中国官员”从泰晤士河畔踱来，见到了同样来得很早的威灵顿公爵，两人似乎一直形影不离，而当“被弄糊涂了”的张伯伦勋爵请示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如何安排这位“中国官员”时，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交代“最好将他安排在坎特伯雷大主教与威灵顿公爵中间”——威灵顿公爵似乎也参与了此事，而他的作用似乎就是与“那个中国官员”形影不

离，以帮助“那个中国官员”顺利完成这一整套仪式。

四

维多利亚女王 18 岁登基，到 1851 年伦敦博览会之时也才 33 岁，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也是想法十分大胆的人。与一般皇族不同，他们还是一对相亲相爱、相互帮助的模范夫妻。不管怎样，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英国赢得的丰厚利益，使维多利亚女王急于协调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既然中国政府拒绝派员参加博览会，那何不自己去找一个“中国官员”？如果在这个举世瞩目以及各国皇室成员和使臣在场的隆重仪式上，让一个“天朝官员”出现并面对站立在台基上的英国女王行鞠躬礼，那就不仅象征性地将“天朝”降格为“万国”之一，也规定了今后英国使臣觐见中国皇帝时的礼式。这也是一种向万里之外的中国政府间接传话的方式。

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廉·萨克雷没有被邀请参加开幕式。出于一种讥讽，他说自己以前见过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没必要去凑这个热闹，但他后来还是花了几个基尼（价格不菲），买票进了“水晶宫”。周围的人都在谈论“水晶宫”以及

出现在那里的各国名流。而“那个中国官员”在口耳相传中渐渐变成了“中国大使”。但萨克雷显然去过“耆英号”，见识了那位“中国大使”。不久后他写了一篇参观“水晶宫”的文章，其中讥讽了许多名流，当然也不会放过那个“中国大使”：“我们在嘲笑了一番那位够诚实的筷子阁下（那位表情滑稽的中国大使）的古筝之后，我们这些在画廊里的人大多认为象牙筷阁下和乌木筷阁下的表演也不比筷子阁下好多少，我们真希望仪式的这一部分没有发生过。”^[14]所谓“象牙筷阁下和乌木筷阁下”，指的是开幕式上那些皇族和贵人。

萨克雷没有洞悉到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这个秘密的策划的意义。其实，维多利亚女王急于见到任何“真正来自中国”的人，以便制造一种和睦的中英关系的神话，抵消鸦片战争给英国造成的道德损害，因为战前战后，无论英国国内还是国外，均有指责英国以鸦片问题对华开战是一种令英国国旗蒙羞的行为。机会果然来了：伦敦博览会开幕式过去三个多月后，一艘装着丝绸、茶叶等中国特产以及一个中国家庭的船在经历从广州到英国海岸的漫长航行之后，于 8 月上旬终于驶入泰晤士河。8 月 23 日《伦敦新闻画报》报道称：

上周一，最近刚从广州搭乘英国船只“皮尔女士号”直接来到英国的一个中国家庭，应女王的特别邀请，由菲利普中校护送到了怀特岛上的奥斯本宫来觐见维多利亚女王陛下。这个家庭包括一个名叫钟阿泰（Chung-Atai）的绅士、他的两位妻妾、他的小姨子以及一位中国女仆。那三位女士都拥有作为中华帝国上流社会女性标志的小脚……女生们在钟阿泰先生、跟他们一块儿从中国来的克劳福德先生和已经在本地居住很多年的莱恩先生等人陪伴下，按照女王陛下的意愿，在11点半的时候前往奥斯本宫。女王、阿尔伯特亲王殿下以及皇族下一代的所有成员，都在国宾接待室里欢迎这个中国家庭的到来。中国客人是由华茂公司的少东家哈蒙德先生介绍给女王陛下和其他皇族成员的。^{[15]90-91}

文章记述了这个中国家庭与英国皇室成员在岛上长达一天的活动，认为是“迄今所知享受到这一崇高特权的首个中国家庭”。一周后，《伦敦新闻画报》又刊登了一篇有关这个中国家庭的报道，称“因涉及缠小脚的士绅女眷们的出洋，这个中国家庭在广州经历了当局设置的各种障碍和刁难”，但在华英国传教

士、英国商人和英国驻华领事的策划下，一切困难都解决了，“1851年2月20日，他们在香港登上了开往伦敦的‘皮尔女士号’船”，“本月10日到达了格雷夫森德。这个中国家庭全部安全登岸，并且受到了英国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参观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周六他们已完成了这个心愿”，由于女士们全是小脚，不适合拥挤的场所，“更为妥善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趁上午为残疾人安排的专场去参观。所以他们便穿上了本国生产的漂亮刺绣绸缎衣服，坐在巴士的轿椅里，被人抬着去水晶宫里转了一圈。他们对于自己看到的每一件物品都感到非常喜悦和惊奇。他们也受到了世博会管理委员会一位执行董事的殷勤接待”。^{[15]91-93}

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心思算是琢磨透了，因此策划了这起“一个中国家庭远道前来伦敦参观博览会”的事件。考虑到这个“中国家庭”并非参展商，而是与一船的“中国产品”同来，那么，他们自己也就变成了博览会上的“活人展”，正如伦敦“唐人馆”的那个华人家庭。伦敦博览会全称是“万国工业品博览会”，它同样是“万国人种博览会”。特雷·埃林森谈到伦敦博览会期间伦敦的人种巡回

展时说：

人种学不再是小圈子的专业学问，它同样变成了一个大众娱乐工业。美国演出经纪人 P. T. 巴伦策划了将一些美洲印第安人运到伦敦进行巡回展出，他常常与艺术家兼人种志学者乔治·卡特林合作，而后者在伦敦博览会期间资助了在“水晶宫”展出一个中国家庭，他梦想着能够“将经由陆地和海洋可以到达的所有国家的人种代表会聚一起，组成一个万国大会，进行巡回展览”。他接着说：“我的意思是，从每一个国家，无论文明之国，还是野蛮之国，各选一男一女……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没有比这样的博览会更有趣的了。”^[16]

其实，这样的活人展品只可能是“野蛮人”。早在 1842 年 8 月，即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一位叫内森·邓恩的美国人就在伦敦海德公园角建起了那座“唐人馆”。伦敦博览会期间，作为博览会艺术展馆之一，“唐人馆”增添了“中国人展”。据 5 月 24 日《伦敦新闻画报》报道，“伦敦的唐人街（馆）又增添了一组令人赏心悦目的活人展品，其中包括一个名叫潘怡果（Pwan-ye-Koo）（此姓名用了威妥玛式拼音法，且仿英国姓名习惯名前

姓后，可译为邱婉仪——引者）的中国女优，金莲小脚只有 2.5 英寸长。她的丈夫是一位粤剧艺人，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优的贴身女仆和一位通事”“他们的服装鲜艳夺目，式样奇特，高调展示了一个中国家庭的民族特色。他们行为举止既谦卑又友善，非常合乎礼节。同时在家人之间又显示出一种无拘无束和相互照顾的良好气氛，正好能给观众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17]伦敦博览会开幕式后不久，几年前因《简·爱》而声名大噪的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因为书稿的问题也来到了伦敦，她去了“水晶宫”好几次，想必也去了作为附属展馆的“唐人馆”，看了这个“活人展”，并仔细观摩了邱婉仪的小脚。她在随后创作的小说《维莱特》（1853 年出版）中，借一个小姑娘（小波丽）之口，谈到“一个中国淑女”，说“她的脚比我的脚还小”^[18]，言下之意，是作为一个成人的“中国淑女”发育得却像一个孩子。

注释

[1] 总税务司赫德局外旁观论 [M].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四·卷四十.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08.

[2] 钟叔河. 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61.

[3] 斌椿. 乘槎笔记 [M]. 谷及世点校.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4]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 [C].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 John Timbs, Extra Volume of the Year-Book of Facts in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Constructive Details of the Building, the Most Remarkable Articles and Objects Exhibited, etc., London: David Bogue, 1851.

[6] The Royal Commission, Official Catalogue of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1851, London: W. Clowes & Sons, 1851.

[7] Queen Victoria, "Albert's Triumph" (from her journal), The Portable Victorian Reader, ed. Gordon S. Haight,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8, pp. 539 - 540.

[8] 伦敦首届世界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中国官员 (希生) [A].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2 (上) [C]. 沈弘编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87 - 89.

[9] "The Metropolis", in The Spectator: A Weekly Journal of News,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Science, May 3, 1851, vol. 24, London: Joseph Clayton, 1851, p. 412.

[10] Thomas Wemyss Reid,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Lyon Playfair,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99, p. 120.

[11] 在“耆英号”兵船上的中国武

术表演 [A].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2 (上) [C].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90.

[12] "The Celestials at Home and Abroad", in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vol. 72, July-December, 1852,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 Sons, 1852, p. 105.

[13] "Rules for Visitors to the Exhibition of 1851", The Royal Commission, Official Catalogue of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1851, front page.

[14]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Punch Attends the Opening", The Portable Victorian Reader, p. 543.

[15] 到奥斯本宫做客的中国家庭 [A].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2 (上) [C].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16] Terry Jay Ellingson, The Myth of the Noble Sav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244 - 245.

[17] 中国家庭 [A].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2 (上) [C].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88 - 89.

[18] Charlotte Brontë, Villette, vol. 1, Edinburgh: John Grant, 1905, p. 43.

作者单位: 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 陈琰娇)